

家庭再思考： 從保護工作實務現場的觀察談起

張貴傑

壹、楔子

在一場兒少安置個案的研討會，一個四歲起就由社會局處安置的女孩 Z，經過漫長的安置歲月，在 Z 接近 17 歲的時候，已經轉換過七八個安置機構了。

青春期的 Z，因為不斷地挑戰機構管理的界線，蹺離機構，摔壞東西，甚至動手毆打生輔員。逼得每一個機構都從願意接納嘗試，到不得不請社會局處轉安置。

特別的是，每一次 Z 從機構離開，都是回到那個我們眼中不適合他成長的家裡。即便只是幫中風躺床的爺爺買便當，他都甘願；即便生母明白告知社工，他無法照顧 Z，對也沒有什麼感情，Z 仍自願自地用姐姐的身分管著跟他不熟悉的同母異父的妹妹。

當我試著討論讓 Z 返家重聚的可能性，期望透過家庭維繫或是自立的後續工作，也可以讓 Z 重新認識心目中的「家庭」圖像。

當場社會局處的長官直接告訴我，

「老師，這是社會局處監護的個案，我們對他有許多的責任，及來自社會各界的觀點和壓力，除非 Z 滿 20 歲，我們沒有打算讓他這時候返家的」

.....201703 現場心情筆記

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明確的表示臺灣依法安置兒童或少年的基本法規，當然也是社工執行兒少保護工作的法理基礎：

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

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

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從這些條文中可以明確知道除非案家有上述的四款情形，社工是不能任意安置兒童或是少年的。而從 Z 的 13 年漫長並頻繁轉安置經驗裡，彷彿就沒有被這個系統安全的接住，甚或是整個兒少保護的系統中，有多少專業人員真地能夠理解 Z 的「離機構出走，只是為了回家」的狀態？

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5 條另外針對安置之後的相關規定：

依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

前項長期輔導計畫得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團體為之。

這個條文直接揭示安置兩年以上的兒童及少年，預估他的家庭功能如果無法健全或無法返家，社工及機構需要提出長期的輔導計畫。立法的周延及善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Z 的故事的無奈與現象，好

像也是一種真實。這份文章試圖從這個位置當成立足點，想進一步討論「家庭」這個做為社會組成最小的單位，對於社工在進行處遇及介入時，可以帶著怎樣的視框與之工作。

貳、從數字檢視臺灣的兒少保護工作的意義

從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7）的資料顯示，兒少虐待的通報數字從 2006 年的 13,986 的通報數，到 2016 年的 54,597，十年間，整整幾乎成長了三倍以上。從這裡可以試著推論，或許因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推動以來，責任通報單位及民眾對於通報意識的抬頭，讓原來是兒少虐待的黑數可以浮現出來，當然似乎也反映對於臺灣社會管教子女的意義，也從家務事，翻轉成為社會共同關切的事宜。

接著從 2016 年的兒少保護處遇類型的數字來看，在家庭處遇中，家庭重整類型個案戶數 5,855，個案數 7,977；家庭維繫類型個案戶數 19,936，個案數 22,532；停止親權與改訂監護數 1,273；少年自立生活方案數 276；其他類型處遇 1,613。在這樣的數字看起來，臺灣兒少保護工作的現場裡，透過家庭維繫的處遇方式是最主要的工作形式，兒童與少年仍住在家中，但是社工需要進入家庭協助家庭關係的調整，降低風險程度；而兒少被安置，社工繼續努力與原生家庭工作的處遇模式，也反映出兒少被安置的狀態；更看見

長期下來，臺灣的兒少保護系統中需要走向自立生活的需要，這顯示當原生家庭無法提供孩子生養基本環境的時候，社工必須讓孩子在十八歲到廿歲左右練習獨立生活的可能性。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中即已明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安置兒童及少年，應循下列順序為原則：

一、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

二、安置於已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

三、收容於經核准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四、收容於其他安置機構。

於是，再進一步檢視數字，2016 年兒少安置的總數大約有 10,361 人，雖然比起 2012 年的 19,714 十年來中的高峰人數總數是下降了許多。而在 2016 中，透過緊急安置中的個案有 528（其中親屬安置有 29；家庭寄養 111；機構安置 244）；而持續安置的個案數有 858（其中親屬安置有 58；家庭寄養 335；機構安置 465）；仍住在家中 8,897，其他處遇 202。每年的兒少保護工作現場裡，還是有將近一萬多個臺灣家庭的孩子被以保護的理由安置在各種的處所。

雖然施行細則已經明訂安置場域的排序是由親屬家庭、寄養家庭，到安置機構。可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從實際安置的數字來看見實務現場的困境，這些不只是衛生福利部的統計數字而已，而是代表著每個數字的背後，都有著一個家庭的故事

與遭遇。

再者，這些兒童與少年的人生正在經歷一個我所無法經驗的歷程。不同場所安置數字的多寡，也正反映出「法規」與「實務」上的落差，正是帶給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立足點。

參、實務現場社工的掙扎

從上一節次的數字可以看見，各縣市政府對於兒少保護安置的處境與壓力。在我多年與實務現場社工的專業團督與個案研討會的經驗裡，常常有現場的社工告訴我「老師，我到底要不要安置孩子啊？我懷疑自己作的這個決定（家外安置），對孩子真的是好的嗎？」這是一種莫名隱形的壓力，來自兒少保護社工這個職場上所給予的權責，亦即保護孩子的生命，但是也就往往會有「孩子的生命經驗，掌握在社工的一念之間（號稱的專業判斷裡）。」這真地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啊。施巧儀（2015）就在她的論文中以「但當社工的服務和決策存在差異時，代表受虐兒少、家庭可能會因不同社工而有不同的決策，不僅讓人懷疑社工的專業判斷，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樣的結果極可能影響兒少的一生（摘要）」作為研究起點，便也凸顯了這個樣態擔心的存在。

陪伴少年的兒少保護社工，在實務場域裡，常常有兩種基本的處遇思維左右著社工的處遇評估與介入。分別是「兒少最佳利益」，以及「家庭是孩子最佳成長場所」的兩條路徑思考與面對抉擇。

在「兒少最佳利益」的思維下，作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一個國家機器是要能力補足在兒少成長過程中的照顧歷程，不論是親屬安置、寄養家庭安置、機構安置的服務。需要進一步思考該如何創造，因為家庭變故，或是家庭暴力虐待而被迫離家兒少適合的成長環境。

安置是兒少保護工作處遇的其中一種選項。何時啟動安置？安置是否是最好的處遇介入模式？安置處遇社工的心中必然存在著「兒少最佳利益」的核心價值，但在實務運作上常與「社工最佳利益」、「機構最佳利益」或是「政府的最佳利益」交錯糾纏（彭淑華，2007b）。

當我們認為原生家庭不適宜兒童少年健康成長，那麼我們創造出的寄養家庭、安置機構環境有是否真的適宜兒童與少年健康成長？而這些正是我們擔心的部分。安置機構虐待的事件時有所聞，而荒謬的是，一方面我們指控著孩子的原生家庭疏忽照顧、兒童虐待，但是當我們把孩子放進社會福利系統安置的時候，卻遭遇另一個傷害的開始（彭淑華，2007a）。這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當機構虐待浮出檯面，更需要呼應彭淑華的呼籲，如何在以兒童少年最佳利益的思考下給出最適當的照顧環境？

當然，社工在面對這樣的處遇思維中，必須透過收集原生家庭不適宜孩子成長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判斷。但是，社工的養成、教育訓練及實務工作真的能夠讓社工作出明確的判斷：什麼是對孩子是最好的成長方式？

另一方面，如果是「家庭是孩子最佳成長場所」的思維，那麼國家的家庭福利政策與保護的體制就會朝向如何豐厚家庭問題解決、資源及面對家庭壓力之後的因應能力。在這樣的視框中，家庭被視為一個整體，相信著家庭是兒童最佳的成長場所，兒童虐待及家庭暴力事件被視為家庭壓力因應不良的狀態，透過社會工作者的介入，家庭有機會恢復面對壓力的彈性（謝秀芬，2004）。在這個觀點下，社工面對的是一整個家庭動力的複雜，需要能夠抽絲剝繭的介入處遇，而關切的焦點是，即便是兒童暫時的家外安置，仍然堅信家庭才是兒童與少年最佳的成長處所。

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規範下，這兩種思維必須在社工面對家庭遭遇變故與兒少虐待的議題時，能夠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及面對評估、處遇與介入的背後思考。但往往在實務工作上，社工的訓練裡卻比較少提及這樣的兩種非對立卻又迥異處遇的兩種觀點的折衝。

劉淑怡（2009）在她的研究中，透過17位從事兒少保護工作一年以上的社工深度訪談後，試圖去理解受虐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抉擇的觀點。在這份研究中得到幾個結論，其中兒少保社工在緊急安置與繼續安置考量的差異中，研究者提及立即性保護兒少安全與長期間掌控兒少的風險間的考量差異。亦即在整個安置的過程中，社工是需要不斷與家庭工作，並進行評估的。而在「保護」的概念下，我們會不會過度擔心並直接取代了家庭應有的能力與功能？

在同一份研究中也提到社工在安置過程裡所面臨的兩個困境：分別是評估的困難，其中包含了教養的尺度難以衡定、客觀證據力不足時該如何判斷、如何評斷出什麼是正確的資訊、精神虐待類型難以評估；其二為執行的困難，包括安置資源不足、72 小時的時間限制、後送單位品質的問題、青少年後續配套資源的不足、關於安置的法律議題不熟悉、相關網絡成員的壓力、來自外界聲音的壓力、社工員人身安全的憂慮。的確，社工常常是透過兒童及少年的現況，從外部的視框重新框定了一個「家庭」所需要具備的功能，不論是教養模式、抑或是家庭的性質。

「因為原生家庭不適合兒少成長，所以需要將兒少安置在更適宜的處所或環境」以及「不論原生家庭如何，和兒少的血緣與關係是重要的資源，如何重構家庭關係才是社工的工作重點」的兩種思維，常挑戰著每個兒少保護社工的判斷與處遇的方向。在這樣的內在交戰之間，或許我們可以試著以發展性的觀點思考兒少保護工作「安置」與「家庭處遇」間的合作關係。

亦即，除非原生家庭被宣告完全無法工作，當家庭面臨高度破壞性的壓力事件後，「安置」就會變成選項，提供兒少暫時安全成長的照顧環境，目的是要讓兒少帶著學習到的能力返回家庭，成為原生家庭的一個種子；同時「家庭處遇」工作的目標是將家庭壓力暫時降下（因為兒少已經離家安置），重構家庭組織與連結的新合作模式；適當評估後，再讓兩者重返家

庭，重構新的家庭運作模式。當然，我們就先檢視自己對於家庭的視框？

肆、檢視我們對於適宜兒童成長「家庭」的視框

社會學家 Coontz, S. (1992) 認為家庭的意義要看在哪個時代，哪個文化下給出的定義。但沒有改變的是家庭總是在某個更大組織或團體下的小部分，而在歷史因素下更顯得如此。

陪伴臺灣的兒少保護工作社工專業成長的歷程中，筆者發現實務工作者對於「家庭」形象融進了保護工作的實質裡。在這樣思維下愈來愈多的「家庭」被判定「失功能（dysfunctional）」的命題經過時空的轉換顯得越來越刺眼，到底什麼樣的家庭稱之為具有功能的家庭？那又有怎樣的條件下，家庭可以被稱之為失功能？

筆者曾在「家庭社會工作」的課堂上進行一個作業，邀請我的學生對於理想家庭與實際家庭的經驗進行分享，並據此經過三年以上的資料收集，從學習社會工作的大學生身上試圖去詮釋「家庭」對於他們的意義是什麼？從研究中發現正在學習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準社工們所定義的「家庭」意義，多半來自課堂上的教導，而其中的視框更充斥的「中產階級」「正常」家庭的行為模式，研究中發現在社工系學生的眼中，家庭是需要血緣及法律要件所產生的；而透過學生的經驗中發現家庭的親代議題也會滲透至子代的生命議題

中，或是過度承擔家庭的責任（張貴傑，2016）。

Froma Walsh（2006）在她的書裡提到，關於所謂的「正常家庭」概念上的幾個迷思，其一是似乎只要是健康的正常家庭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錯誤思考，因為這樣的觀點會讓這個家庭在對抗壓力，生活挑戰與創傷經驗的努力都被抹平了；其二，這個名詞假設了有一種單一價值，共同的健康家庭模式，然後要符合傳統的家庭理想圖像，而這樣的思維下，許多不同的家庭價值、家庭結構與性別角色被視之為失功能的。

「家庭」是否具有功能的思維，也正反映出了一個政治正確的價值判斷。而課程中所熟悉的「中產階級意識」所建構的家庭模式，強調的是親代需要能夠完整的提供子代的教與養的能力；家庭是需要打掃及乾淨的；兒童是需要細心呵護及照顧的；一日三餐是正常的；兒童放學的時候，父母是需要接送或是在家看顧的...諸如此類的期許，正是社工跟家庭工作判斷的基本思考。

劉淑怡（2009）的研究中提及社工認為家外安置的功能是：「公權力的示範」、「給孩子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可能產生負面效果的權宜之計」、以及「暫時舒緩家中存在的壓力」。從這樣的點可以看見，背後隱含的是家庭需要為了兒童的成長盡量給出最大的可能性。

在兒少保的工作中，每個社經地位的家庭都有可能發生家暴或是兒虐事件，但是一個家庭是否能夠支持每個成員發展

自我的效能，也要看這個家庭是否具備有足夠的資源提供。家庭福利服務的推動反映的正是對於家庭整體價值與意義的肯定。透過由中央到地方的推動，試圖能夠讓家庭多重與多元的服務能夠穩定社會的基礎單位。

在評估兒少保護兒童是否需要家外安置的時候，原生家庭是否具備有重建的可能性，直接影響兒童與少年待在安置處所的期限。我們必須要問自己，什麼樣的家庭「足夠」好得能夠讓每個成員在其中找到成長的方式。在 Z 的故事中，透過社工的報告，她的原生家庭彷彿是一個毫無關係連結，也無法討論友愛或慈愛的環境，但是 Z 幾年來的蹣跚機構而停留在這樣的家庭裡，這反映出來的又是怎樣的社會意義？

或許，沒有人有資格替 Z 說話，但是她的行動也一定有某種我們需要學習的意義。當我們急著判定這個家庭是否失功能的時候，家裡面的人，或是被整個兒少保護體制所保護的 Z 心中，這個社工口中所謂冰冷的家庭，是甚麼樣子的存有？

伍、家庭韌力取向的家庭服務模式（family resilience approach）

筆者早期就讀博士班期間，大概 1997 開始就有機會與兒少安置機構接觸，至今有長達 20 年協助安置機構轉型，建構專業管理制度，以及陪伴兒少成長的實務經驗；在擔任教職之後，也從臺灣

地區的寄養家庭服務方案的研究（張貴傑，2007，2008，2011）開始認識不同型態的安置樣態，也在 2008 年起開始參與寄養家庭招募與訓練的工作；隨著專業角色的發展，在兒少保護的工作中，常常在各縣市擔任第一線實務工作社工的督導與各項會議的專家角色。

累積的經驗發現，「家外安置」是社會工作不得已的處遇與介入，在維護及保護兒童與少年成長所需的基本環境的思考下，當原生家庭面臨重大變故的時候，安置是一個家庭減壓的手段，但是如何協助原生家庭在面臨高度壓力下重整，才是真正背後需要社工投注心力的工作。

Froma Walsh（2006）綜合了國際上對於「韌力、復原力（resilience）」的相關研究後定義「家庭韌力（family resilience）」為「辨識與強化家庭裡重要的互動歷程，讓家庭能夠承受破壞性的生命挑戰，重新能夠站起來（to identify and fortify key interactional processes that enable families to withstand and rebound from disruptive life challenges. P.3）」。

從這樣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家庭不只被視為一個整體（wholeness），而是在面臨破壞性的家庭壓力下，這個家庭可以如何重新連結彼此的關係，具備有彈性的合作模式，以及能適當的尋求與運用資源，讓家庭回復穩定的狀態。而這裡面包括了每一位家庭中的成員，而不是只有父母在面對衝擊。

Froma Walsh 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管理學院的教授，她統整所有的韌力研究

後，不再標示家庭為失功能或是有問題的，她改稱這樣的家庭為面臨困境挑戰的家庭。從這個名詞的改變，便視家庭為一個正在遭受挑戰的主體，這樣的挑戰，是全家人同時受到波動的，在家裡的每個成員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於是她發展出家庭韌力取向的服務架構（family resilience approach framework, p131）。

家庭韌力服務取向透過信念系統（了解逆境對於家庭及個人的意義、對逆境保持正面展望、從更大的視框超越性及靈性檢視逆境）；組織模式（具備彈性以因應挑戰、能相互支持與合作、啟動與連結社會與經濟資源）；以及溝通歷程（具備清晰的交流、坦誠的情感的分享、協同合作的解決問題）三個面向九個關鍵歷程來進行家庭的服務模式。

在這樣的取向與服務模式裡，整個家庭被視為具備面臨挑戰的基礎，即便被家外安置的兒童及少年，對於家庭面對的破壞性壓力並不會比父母承受得更少。如何讓安置的兒童及少年仍能夠感受到還是家庭的一份子，能夠為這個家付出關心，也能夠讓孩子受到與這個原生家庭的連結。在這個工作模式的思考裡，或許我們可以沉澱「如何協助一個家庭能夠在面臨破壞性壓力的時候，能轉化這樣的經驗成為成員與家庭間的韌力養分？」家庭成員共同承擔家庭所面臨的壓力，而彼此藉著合作性的努力改善家庭的情況。

當然安置服務及家庭處遇的社工也可以思考「家庭」的價值與樣態的多元可能性，「家外安置」的手段是協助家庭及兒

少成長中的一種選項，但是機構的良窳、寄養家庭及親屬寄養的現況，都可以是需要努力的方向，但無論如何，兒童與少年的原生家庭重整與關係維繫的家庭處遇策略，更是一個可以深化的工作手法的介入的焦點。

視家庭為一個整體，視家庭整體共同面對家庭壓力衝擊，保護兒少之餘，我們也可以思考如何提供家庭多元的價值與工作方向。

陸、結論：兒少保護工作裡的家庭再思考

「家庭」經歷時代演進，在政治經濟的條件下，已然不是單一價值所能夠描述清楚的；但是社會福利的設計與推動，更是需要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許多反思的。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想要呈現的是在兒童虐待與保護安置的服務模式中，如何突破「兒童最佳利益」與「以家庭為核心」服務概念下的折衝模式。胡慧嫻（2013）曾從社工代表法與政府的角色討論家務事的視框，去試圖看見由外在視框及法制的角度中，社工如何能夠對於家庭有所作為。

筆者在督導及個案研討會議的場合中，常提及「家外安置」的最終目標還是協助孩子返家，或是能夠讓孩子順利自立融入社會。家外安置不僅是親屬安置、寄養安置與機構安置這樣類別的思考而已。第一線社工，面對保護工作需要啟動家外安置的決策時，必須同時思考兒童及青少年的融入社會的安置處遇，以及安全的家

庭處遇作為。

不論是第一線的社工或是政策制定的專家學者與相關的人士，面對「家庭」的多元樣態，是需要能夠進一步的從在地的生活經驗，與家庭成員的主體性經驗中出發。而「保護工作」絕不是僅僅把兒童與青少年「家外安置」保護的思考。在面對經濟、政治等多重壓力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協助此刻臺灣家庭應有的價值與資源，是否足以支撐兒童與青少年的成長所需。

另外，臺灣的家外安置更需要面對的機構與安置樣態的種類與定位的議題，分級分齡，與分類的思考似乎是要開始啟動，而不只是運用一套安置的評鑑標準就能進行規範與設定的。諸如寄養家庭之於安置兒童與少年的影響，在長期與短期間的拿捏；中長期機構對於安置童的規劃與著重的發展，必定與緊短安置機構有所差異；司法轉向的安置，與家庭暴力及兒童虐待的安置亦屬不同的性質，這些都值得再反思而進行討論，才能逐步建構屬於臺灣實務經驗的工作模式。

另外在這篇文章中，的確把家內亂倫與性侵家庭暫時擱置在括號裡（亦即這種樣態家庭的特殊性，或許還需要專文另外討論）。

「家庭」在兒少保護工作裡的愛與愁，更是需要我們反躬自省。家庭可以被視為社工的資源之一，除了社工原生家庭經驗的整理與反思之外，對於服務對象的家庭觀點的檢視，更需要好「再」思考。

（本文作者為玄奘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

處遇

關鍵詞：兒少保護工作、家庭韌力、家庭

參考文獻

- 胡慧嫻 (2013)。清官能斷家務事？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個案處遇角色作為之省思。**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3(1)，61-97 頁。
- 施巧儀 (2015)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安置態度與安置決策之相關性探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彭淑華 (2007a)。「寧缺毋濫」？「寧濫毋缺」？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機構安置決策困境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 (2)，127-154 頁。
- 彭淑華 (2007b)。機構安置：保護他（她）？傷害他（她）？－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眼中之機構虐待圖像。**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6，1-36 頁。
- 張貴傑 (2008)。**臺灣地區寄養家庭服務方案本土工作模式建構與相關政策規劃之研究**。臺灣兒童與少年扶助基金會委託執行專案。
- 張貴傑 (2016)。大學生對「家庭」觀點初探：以社會工作系為例。**人文社經論叢**，3，103-112 頁。
- 劉淑怡 (2011)。**受虐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的抉擇－從兒童少年保護社會工作者觀點出發**。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 謝秀芬 (2004)。**家庭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臺北市：雙葉書廊。
- Coontz, S. (1993).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lsh, F. (2006).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2nd)*.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